

傳記文學叢刊

民國百人傳

第三冊

吳相湘著

民國百人傳

第三冊

吳相湘著

③ 八十之刊叢學文記傳

傳記文學叢刊之十八③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民國百人傳第三冊

平裝本每部四冊定價新台幣八百元

精裝本每部四冊定價新台幣一千二百

著者：吳 相 湘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〇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

民國百人傳 第三冊 目錄

張君勳老鶴萬里心	一
左舜生常懷千歲憂	三七
江亢虎與中國社會黨	五五
陳炯明「造反出身」	六九
陳獨秀悔誤晚矣	八五
李大釗口蜜腹劍	九七
徐謙甘爲赤色傀儡	一一三
鄧演達妄想立異	一二五
唐生智與如來佛	一三七
何鍵實行剷共	一五一
劉文島內交外務	一六三
沈鴻烈護衛海權	一七一

程天放持節柏林	一七九
張道藩甜酸苦辣	一八五
董作賓創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一九一
羅家倫修史不成編	一九七
易培基與故宮盜寶案	二一七
程潛晚節不堅	二三一
楊杰著「國防新論」	二四五
張之江與西北軍	二五一
「項城勁敵」岑春煊	二五九
章士釗倡「新舊調和論」	二七五
李根源創政學會	二九三
文群注意農村經濟	三〇九
「曠代逸才」楊度	三二三
「遁甲術專門」之袁世凱	三二七
楊雲史獨步江東	三五一
畑俊六日誌中之汪精衛	三六一

張君勳老鶴萬里心

張嘉森是我國現代史上稀見的具有哲學修養的政治家。嘗自言：「不因哲學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學。」事實上：張一生喜愛哲學，而其生命重點在政治。其研究哲學在鼓舞理想主義的情調，以爲中國建立一有憲法基礎的民主政體。

張具有繼承顧亭林、王船山以天下爲己任的偉大懷抱，而其好學不倦老當益壯注意世界新潮之精神與學養，尤非時人所能及。創立「中國國家社會黨」，又擴大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終因格於時勢，未克有所展佈。

自民國十二年「人生觀」論戰揭幕，張即以駁斥唯物論爲職志。九一八事變後，張提出「自信心之提高」與「自己過失之檢討」爲復興民族之大道。手撰口述，勉勵國人，不遺餘力。神州陸沈後，張於此用功尤勤。再四強調：今後中國文化進展之途徑，在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結構。復興儒家學說，以求銘鑄東西文化。力言孟子爲立極之哲人，應與柏拉圖、康德較其得失，求其異同。

民國初年，章炳麟嘗用杜甫詩句——「鰲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書聯贈張。今綜其晚年言行，可謂恰如其分之寫實語。

張嘉森，字君勳，一字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一八八七年一月十八日（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江蘇省嘉定縣城。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美國舊金山逝世。

張出於一儒醫與經商兼備的家庭。七世祖在真茹鎮業鹽，曾祖懸壺鎮上，施藥濟貧。祖銘甫，始登科甲，入宦途，在四川省任知縣十餘年，有政聲。喜研宋儒義理之學，亦究心於醫卜星相。既倦仕進，退隱田里，居嘉定縣城。父祖澤，學醫於蘇州曹滄州，既卒業，先後設診於上海、南翔，爲名醫。全家生活均賴診金所得爲支持。嗣經營商業，不幸挫敗，景況蕭然。母劉氏艱苦撐持，猶能於儉約之中，不失詩禮家風。

上海廣方言館出身

早稻田大學洋翰林

張嘉森六歲時，始與四伯父諸兄弟同入家塾讀書。善讀亦善嬉戲，每獨出心裁，有軍師之稱。一八九七年，張十二歲，奉母命考入上海廣方言館。此爲「洋務運動」一產物，當時風氣未開，人重科舉，故入學者均清寒子弟。每月給予津貼銀一兩。每周上課七日：四日上午習英文，即數學、物理、化學、外國歷史均用英文課本。必須熟讀背誦。三日上午讀國文。教師袁希濤講解「三通考」極詳明，張因此啓發，注意興地掌故之學與政治制度之演變。沈位卿講授「策論文」對張尤多裨益。一九〇二年，張應寶山縣試經義策論，中秀才。

張在廣方言館肄業四年，奠立英文基礎，亦頗知世界大勢。戊戌政變後，目睹清廷通緝康梁之相片懸掛方言館門前，即有委身國事壯志，亦心儀康梁之言行，爲梁啓超書報之忠實讀者。一九〇三年，「新民叢報」刊載「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張閱讀後，欣然嚮往，投考入學。所習課目均用拉丁文，教讀甚速，馬和（君武）亦同窗攻讀。張用力殊勤，祇以每學期學雜費用需銀一百兩，家中無法繼續負擔，遂退學，赴南京，入高等學校。肄業不一年，以簽名參加抗俄義勇軍，被校方認爲革命行爲予以退學。於是張在國內求學生涯從此結束。

其時，各省青年紛紛往日本遊學或留學，張亦曾以遠遊意請求父母，未獲允准。適得友人介紹往湖南長沙明德學校任英文教員，在校僅兩月，因江蘇寶山鄉前輩朱其珍任常德知府，延聘張前往常德師範學堂任教。前後兩年，授課時論及國際情勢列強侵略，語調激昂。學生殷士奇等聞之嗷嗷大哭暈倒於地，震動士林。張旋往豐縣任教，兩

地月薪所入儲蓄約四百餘銀元。一九〇五年冬，學期結束，張辭卸教職束裝回里，舟行洞庭湖中，誠惶誠恐，因留學資金盡在行篋中，輒以竊盜爲懼，夜不安枕。幸一切平安。一九〇六年三月，張得遂所願，經寶山縣派送日本。按規定應入高等師範理化部，而張當時志願在習陸軍或政治，志不在聲光化電；然因急求出洋不得不姑爲承認。領得全作公費，易日鈔、購船票、更服裝、去長髮後乃與同行七人自上海啓程。到達東京，不習於席地而坐，乃購置桌椅^三用，陳設一如國內。暇時友朋過從聚餐，放談高論。其隨心所欲，遇事無吝色，與豪爽好客，殆自此時成其習性。

張在國內求學時，嘗於黎明焚香一柱，讀朱子「近思錄」，極感興趣。到達東京不久，值諦閑大師東遊講經。張按時往聽講，得識張東蓀（一八八六年生，浙江錢塘人），從此成爲知己。

一九〇六年九月，張嘉森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此與寶山縣規定不合，公費停止發給。存款用盡，乃撰稿投送素喜閱讀之「新民叢報」，亦因此而得識景仰已久之梁啓超（參見本書第五冊「梁啓超傳」）。與蔣方震等亦於是時訂交。

張在早稻田大學四年，各課教授均一時名師：如政治學：浮田和。國際法：中村進午。憲法：有賀長雄。財政學：田中穗積。經濟學：鹽澤昌貞。張於日本語文基礎不深，幸校中規定參考書大多英文著作，如（一）Wilson: The States (ii) Burgess: Constitution Law (ii) 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四) O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五) Bastable: Public Finance。張於英文早可運用自如，即考試亦經教授同意應用英文作答。尤其浮田和教授主講政治學選科，應用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爲教本，以僅有張嘉森一人選修，故上課時常與張并肩而坐，循循善誘，和藹可親，使張求學興趣益濃。

早稻田大學雖多用英文參考書，各教授講課時却常提及德國學人及其著作，故張又選修德文。某日，上德文課時，因事遲到數分鐘，德文教授藤井厲聲曰：「此地非中國衙門，何能遲到！」張殊感羞愧，留學德國心願亦萌芽

於此時。

一九〇七年七月，「新民叢報」停刊。張原可自此叢報月得稿費六十餘元，以維持本身及其弟嘉璈（字公權，時肄業日本慶應大學）之費用。今來源突告斷絕，請求親友資助，每月僅得十三元，勉敷日常簡單飯食之需。有時購置手巾費用亦無所出。兄弟二人乃將一手巾剖分為二，俟破舊，再就其餘各用四分之一。是年九月十一日，梁啟超、馬良、蔣智由及張嘉森等與留日學生三百餘人在東京舉行「政聞社」成立大會。此為中國立憲黨成立團體之始。發佈宣言揭示：（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張旋承梁啟超命持梁手函回國謁陳三立，請求領導發起憲政運動。不幸竟與康梁政敵相遇，陳急使張走避，仍回日本，繼續求學。次年一月，「政聞社」遷設上海，東京社務則由張嘉森等負責照料，張曾致函梁啟超力贊自辦生產事業及加入官場以廣佔勢力。

自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一九〇九年九月，各省諮議局成立。張與吳貫因等早於是年六月即於東京設立「諮議局事務調查會」，以調查中央及直省之權限與各項行政，藉以求諮議局權限之確定及直省政治之改良。八月，又創刊「憲政新誌」以公佈調查成績，供各省參考。是為張生平首次主辦刊物。同年夏，早稻田大學於熱海舉辦暑期講習班，特聘張主講中國文化，又為張生平講學第一次記錄。

一九一〇年夏，張嘉森在早稻田大學完成學業，得政治學學士學位，束裝回國。為參政便利乃應學部留學畢業生考試。適是期主試注重工科，張持政治學士文憑只能以七十分與試，各科成績平均計算，自料難於獲選，姑一試之。不意考試成績各科均滿一百分，主試者特予優異，將其文憑分數增為七十五分，總平均分數遂列優等，翌年（一九一〇）夏再應廷試獲選。六月十一日，清廷授以翰林院庶吉士，即世人所謂「洋翰林」。

迎接梁啟超回國 · 嚴斥袁世凱惡政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後，張返寶山出任縣議會議長。並與胞弟嘉璈共同發起「神州大學」與「國民協會」。黎元洪等曾託請張赴日本迎接梁啓超回國。梁之友好同志當時亦多主張聯黎以自重。惟張嘉森奔走南北後致函梁建議聯合袁世凱以便將來結成一大黨。張以爲「袁氏爲人詭譎多術，頗不易合，則森以爲聯合之目的，並非在爭政權，藉其勢力以發展支部於各省，數年之後雖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持此術以與袁氏合，爲道當亦非難，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於吾輩者，頗不乏人，藉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則黨勢愈厚，今後之中國，非造成一大黨以爲改造事業之中堅，則建設必不能完備，而危象且隨而發現」。中國南北情形迥異，比較容易着手者實在北方，如欲進行，亦應先北而後南，所以應與袁合者，此亦一因。」張嘉森此議，對於梁與袁合作有其重要影響。

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月，張嘉森與湯化龍、林長民、孫洪伊發起「共和討論會」於上海，以集合同志，爲組織政黨之準備。張湯孫等與梁啓超有舊，故亦邀請梁入會，且常與書信往還，隱然有奉爲黨魁意。

其時，國內大小政團風起雲湧，泰半爲爭權位而不知有政綱，其間悲歡離合，怪象百出。七月四日，張寄書梁主張在「協會」及「討論會」與共和黨之外，另造一黨，聯合中國人物共同發起，以梁與蔡鍔領銜。「協會」與「討論會」會員均加入。「如此辦法，則一極大之第三黨，必可造成，而吾輩政見之發揮，較之加入他團者必易爲力」。八月，專以宣傳政治知識而不競逐政權之「民主黨」成立。張旋被公推代表民主黨赴日本迎接梁啓超回國。十月二十日，張陪隨梁一行到達北京，朝野熱烈歡迎此亡命海外十五載之維新領袖。各處邀請演講，梁均欣然接受。張則自任聽講筆記之勞，旋編印成「梁先生演說集第一輯」出版。

是年（民國元年）十一月三日，俄國不顧我之抗議與外蒙古簽訂「俄蒙協約」。消息播傳，舉國沸熱如狂。時張對袁世凱內政措施已多不滿，今又聞此外交大失敗，不安緘默，乃與黃遠生等集議十日，卽於是年十一月廿一日創刊「少年中國」周刊。指斥袁只知培植個人勢力、爲亡國之罪魁。每期印行二千份，出版當日即售罄。張所撰「袁政府對蒙事失敗之十大罪」一文，尤傳誦一時。張於文中指陳袁政府措施之乖誤：「考其大因，尤其當局者，

但知顧全權勢，不爲國家謀根本之解決。「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碍，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吾黨以爲推此心理，非至亡國不止。用將政府罪狀宣佈天下，望全國國民急起直追，自負責任，逕行詰問政府誤國之罪，並決定全國大政，以一致之精神，爲對外之計劃，庶足以振民氣而救危亡。」

張、黃言論，可謂當時南北協調中「討袁」之最早稀見紀錄，其激烈語調實超過戴天仇之「民權報」。政治革命呼聲亦不過如是。今人謂此爲蔡鍔等其後起兵討袁之「心理預伏」。而梁啓超當時之政治立場則傾向於維持袁政府，故嘗致書張勳告。張一慶亦有信寄張嘉森促即離京遠遊。民國二年一月，張嘉森乃取道西伯利亞往德國留學。

張行抵俄都小住兩月餘，因其表兄劉鏡人任駐俄公使，介識俄國立憲民政黨領袖米呂哥夫（Miliukov）。且適逢羅曼諾夫王朝登位三百周年紀念，街市喧鬧慶祝盛況，給予張一深刻難忘印象。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月，張到達德國，以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資格入學柏林大學。按學則規定：聽講一年即可提出論文應博士考試。但張上課時自感德國語文程度不夠，努力學習，始可勉強聽講。時柏林大學盛行「大學自由」，即學生選課，完全憑本人意志，並無固定課程約束。張於此至感苦惱。如其自述：「當時我自己在學問上正是求知知識的時候，那能知道何者先讀，何者後讀；何課與何課有關，何課與何課無關；自己茫無頭緒。學校有此自由給學生，而我自己不知道運用，這是最苦的一件事。在清末至民國初年，國內外知識界對於學問有一種風氣：求學問是爲改良政治，是爲救國。所以求學問不是以學問爲終身之業，乃是以救國之目的。我在日本及在德國學校內讀書，都逃不出這種風氣。在德國讀書兩三年，在自己無多大心得。如 Schmoller 經濟學，屬於歷史派。何謂歷史派，自己並不清楚。Wagner 的經濟學是以演繹爲方法，何謂演繹法，亦弄不清楚。兩派何以不同，亦並不加以研究。雖兩三年中讀書甚勤，但始終站在學問之外，學問與自己並未打成一片。」

張在柏林大學求學前後三年。其時尚無今所謂「政治學」，故張選修「國際法」「財政學」「經濟學」諸課。時值馬克思學說鼓盪，張亦加研究，並曾往馬黨徒演講會。歐洲大戰發生（民國三年七月廿八日）後，張特懸一地

圖於居室壁間，每日就戰事發展而標示。宿舍女主人見而訝異，疑張爲日本間諜。又因張嘗言德國必敗，觸怒女主人愛國心，乃報警監視張之行動，禁止外出。張乃按德國法律：自動要求警察入室搜查，並未有任何疑問，乃告無事。翌年秋，張自德赴法比西戰場觀戰。

其時，袁世凱帝制運動正酣，張了解袁與英國關係，且當時各國中亦惟有英猶注意東方事，因於是年（民國四年）十月，離德國經荷蘭到英國。經駐英公使施肇基介紹，得識「每日先鋒報」記者，張乃撰文力言袁叛背國體之非送刊。時陳友仁適爲北京「英文導報」主筆，特自「每日先鋒報」取而轉載。袁政府知有是文，乃電施肇基查究。施因遣其館員曹雲祥面張警告：「中山先生拘囚之室尚存，倘君在英更以文字登報者，惟有待中山先生者待君！」張當答曰：「公等此言既出口，吾惟視爲使館中負責者之言，將報告英政府以求保護。」

張到倫敦時，英國強制兵役法尚未通過，常見街頭招募士兵廣告，與德國人之以被徵服兵役爲榮大不相同。參觀久已嚮往之英國國會，尤感驚奇。張自述云：「我到了十餘年來所羨慕的英國巴力門裏邊，看見勞合喬治在議會裏把雙腳放在中間的一張長桌上，我心中好奇怪。以爲英國莊嚴議會中，何以大政治家的行動如此隨便。後來知道英國議會不像大陸各國議會注重雄辯。英國議會好像我們鄉下紳士聚在茶館中討論問題一樣，是大家聚在一起，求事的解決，並不是逞口辯的，這是英國議會所以能有成功。」

放棄學位回國討袁

極力主張對德宣戰

民國四年十二月，袁僭帝制；蔡鍔在雲南起義。梁啓超電張速歸。張正撰博士論文，欣聞蔡、梁不計生死發難，個人學位更何足論。即決心回國參加。初計避戰地危險，繞道非洲；嗣以時日迂緩，迫不及待，決冒險經西伯利亞歸，船票已購，無可退換，乃罄囊中餘資，重購車票，而存款已盡。民國五年三月自英啓程，沿途經行瑞典、挪威各國而抵俄都，以十三銅元維持七日之費用，僅得麵包白水充饑而已。自俄回國旅費，則貸自劉鏡人公使。四月

，張回國到杭州，爲呂公望堅留，不克赴滇以助蔡鐸，乃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長。旋因上海「時事新報」之邀，兼主筆政。徐傳霖時任上海「中華時報」編務，因此相識。張曾在歐洲居留觀戰，預料德國勝利之公算不多，故在「時事新報」及與友朋言談，均力主中國參戰，以把握機會取消若干不平等條約。梁啓超即因張之影響而極力昌言參戰。十一月，張辭卸浙江事，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編輯。時國人對參戰意見不一。張撰文申說外，又奔走南北，往返陳說。北京政府設立「國際政務評議會」，爲檢討和戰之機關，國務總理段祺瑞兼會長，張任書記長。張乃將「時事新報」總編輯職務交張東蓀繼任後北上。每日與段午餐，輒終席不交一言。面對段祺瑞煊赫聲勢，報之以不苟言笑，所以保持學人風度。每日研究撤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租借地、關稅自主諸問題。或隨梁啓超走訪各國公使作初步洽商。民國六年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宣佈對德絕交。六月十四日，黎大總統令解散國會。七月一日，張勳擁宣統帝復辟。梁啓超爲段祺瑞策劃馬廠誓師，張嘉森則前往南京見馮國璋，並爲馮代理大總統事遊說各方。七月十二日，復辟亂平。十九日，段祺瑞再出組閣。梁啓超任財政總長，湯化龍任內務總長，林長民任司法總長。此外教育總長范源濂，外交總長汪大燮，農商總長張國淦亦與梁有舊。此爲梁領導之進步黨經分合蛻變爲「憲法研究會」（世稱「研究系」）後首次參與實際政治，梁啓超稱此舉「在樹政黨政治規模，實現吾黨政策」。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對德奧宣戰。九月一日，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選舉孫逸仙先生爲軍政府大元帥。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辭職。梁啓超旋亦請辭。

其時，張嘉森在總統府任秘書。不數月，目睹北洋派之不足有爲，乃轉而就北京大學教授。此爲張自歐回國後參與實際政治最重要且忙碌之一。求治心願絲毫未達成，分裂致亂之局勢反以形成。張歲闌反省，茫然不知所以。深感「平生所志，往往以牽於外務，行之數日，又復舍此他求」。「今海內鼎沸，已同瓦解，惟有先盡其在我」，先「治己」。因訂定次年方針：（一）學書寫聖教序。（二）讀漢書每日二十頁。（三）習法文。（四）編大學國際法講義。

民國七年，張仍執教北京大學。一月，張與蔣方震等發起組織「松社」，以讀書養性敦品礪行爲宗旨。蓋深感

「政治」不可爲，而社會事業不可不爲。因上面梁啓超請以會國藩羅澤南自任，每周來北京一二次作有關人心風俗之演講一二小時。社員人數務求極少，僅以平日能相信者爲限，合軍人政客於一堂。標舉數事，爲身心之修養；此外各就知識科學研究，如有所得，互相交換。張致梁函強調：「松社爲一種精神結合，非日日以精神相磨礪，萬無益處。根本方針在先生（梁）以何種精神提倡此團體，並如何爲之不倦而已。」十月，張東遊日本考察。十一月十一日，歐戰休止。張在扶桑聞訊，決意重作歐遊。而梁啓超出遊計劃適亦具體化，促張回國同行。張返抵北京，上書大總統徐世昌言應付歐洲和會方針後，即整行裝。旋隨梁及丁文江、蔣方震、劉崇傑等南下，十二月二十九日乘輪啓程。臨行前夕，梁、張等與張東蓀等通宵長談。「着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梁啓超：「歐遊心影錄」）

隨梁啓超遊歷歐洲

自社會科學轉向哲學

民國八年二月十八日，梁、張、丁、蔣等一行到達巴黎，以個人資格向我國代表團貢獻意見，並訪美總統威爾遜力爭山東問題。不幸未有結果。六月，梁、張等一行離法往各處憑弔今戰場。旅次瑞士途中得蘇聯憲法而譯之。將 Soviet 創譯作「蘇維埃」，迄今仍沿用。時有社會主義者哥茲基與馬克思理論有異，又有柏恩斯坦持修正主義，均具有思想自由之意念，張均與之往還相互討論。九月，「新學會」創刊「解放與改造」雜誌。此爲梁、張、蔣、丁等臨行前夕在上海與張東蓀等商定。今乃由張東蓀負責組成及推動。

梁、張等漫遊各國，自德國南部名都明興往柏林途中，忽念及歐洲著名哲學家倭伊經（Rudolf Eucken）居住附近，因即往訪。此一著名哲學家誠懇態度，尤其立即應允爲梁撰述「新唯心主義與舊唯心主義之異同」。給予張一非常深刻印象，研究其哲學之興趣亦油然而生。張自述以爲「這次見面，可以說是我從社會科學轉到哲學的一個大關鍵」。

如張自述：倭伊經之晤見，是一直接觸動。其下意識中平日潛伏之種種暗潮亦爲促成其研究哲學之機紐：（一）懷疑於民元以後的惡濁政治，所以心裏時常要求一種最基本的方法，對民族之智力、道德與其風俗升降之研究，採取思考的態度。（二）親歷巴黎和會，眼見國際聯盟草案，已有國際上眞無公理只有強權之感。迨五強對山東問題之處理，更使張深切感觸國家本身無強大兵力，外交是空話，國際公法更屬具文。當時張即對同在巴黎旅邸之丁文江憤激表示：決心將所藏國際法書籍付之一炬。自後，張即絕不閱讀此類書籍，而決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國之最基本的力量：不論是道德力、知識力、經濟力，專於此盡心力以求探討。

除上述國內與國際事實之兩大刺激以外，理論之刺激亦使張不滿意於社會科學而轉向哲學：（一）科學之分科性。（二）各科學中之抽象歷程。加以閱讀各種思想史，認識種種變遷，因而了解政治學上、經濟學上，其思想背後有一總潮流。這一總潮流，不能求之於各社會科學，而應求之於哲學。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民國九年一月，梁等一行離歐返國。張遂前往德國耶納（Jena），從倭伊經攻讀哲學。同時，每年一度前往巴黎兼拜柏格森（Henri Bergson）門下。如是者三年餘。張體認倭伊經、柏格森書中，側重於所謂生活之流，歸宿於反理智主義，將一二百年來歐洲哲學系統中之知識論棄之不顧。故張初期治倭、柏兩家學說後，心中即有所不慊，乃同時讀康德著作於新康德派之所以發揮康德者。如張自述：「倭氏柏氏提倡自由意志、行動、與變之哲學，爲我之所喜。然知有變而不知有常，知有流而不知潛藏，知行動而不知辨別是非之智慧，不免爲一幅奇峯突起之山水，而平坦之康莊大道損之於視野之外矣。倭氏雖念念不忘精神生活，柏氏晚年亦有道德來源之著作，然其不視知識與道德爲文化中之靜定要素則一也。」「然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著『純粹理性』一書批判知識外，同時又有『實踐理性』一書，說明道德之由來。康氏二者並重，與儒家之仁智兼顧，佛家悲智雙修之途轍，正相吻合。而康德則爲現代人中認定此宗旨之傑出者。」

張鄭重指陳：「歐洲現代哲學大師，不可勝數。我所以獨嚮往康氏者，其理由所在，可從知識論與道德論分別

言之。」：「康氏全部哲學要點之所在，曰僅有經驗主義者所謂雜亂無章之感覺，則知識無由成立，因知識必先有思想方式或曰概念，以成其爲範型，而後以感覺實之於其中，而有整然之條理。康氏曰：與其謂吾人之感知與外物相符合，不如謂外物與吾人之感知相符合。意即謂以人爲主動，不以外物爲主動，此康氏對於知識論之大貢獻。」「二百年來，早將道德與知識並駕而齊驅之者，康德氏爲首屈一指。」「抑我更有欲言者，科學與哲學家咸認識之成立，有賴於人心之運用者。如是其深遠。我以爲心而果可廢也，人類無思想無概念，而尙何科學可言？此我所以低徊流連於康德之認識論者，爲此而已。」

張對倭伊經、柏格森二氏學說雖不完全宗奉，却曾爲文爲國人介紹之。張且曾與倭伊經合撰一書：「中國與歐洲之人生問題」(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und Europa, Leipzig, 1922)。

民國九年四月，蔣方震等創立「共學社」。九月，梁啟超、張東蓀又成立「講學社」，並將「解放與改造」雜誌改名「改造」。張旅歐時曾抽暇撰文送刊此一雜誌。民國十年夏，「講學社」囑張邀請倭伊經或柏格森來華講學。兩人或因年老或難訂期不能遠行，轉介德國哲學家及生物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氏以自代，經雙方同意後，十二月，張陪同杜里舒氏乘輪東來。

提高國民政治品格

倡行社會主義思想制度

張居留德法三年，時值大戰之後，各國政治均大變動，如俄國共產黨之取得政權、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匈牙利共產頭目白拉昆(Bela Kun)之獨裁制、第三國際之活動等均爲前所未見之新課題，張於攻讀哲學之餘亦於此種種特加注意研究。亦從法律學家卡爾·考爾希(Karl Korsch)學，時時以心得與梁啟超、張東蓀等通信討論。民國十年十月「改造」第四卷第二期刊載張撰「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可見張對國是之主張。其內容要點在中國今後必需：(一)排除武力操縱駕馭式之政治。(二)拋棄人的問題，而以政策主義取信於國民。(三)中國政制之採取，當以英

法德俄制度比較之，而後驗之世界大勢，審之中國國情。且必須黨員守紀律，肯爲主義犧牲。千萬不可因留學國家而有所袒親效法。(四)提高國民政治教育以鞏固政黨政治。其言有云：「吾念之深而思之熟矣，號爲國家，不能無政治；政治之良者，舍民主外，尙有何種？而民主之中，不論蘇維埃與資產階級，要不能無政黨，故今後國家之生死存亡，獨視政黨可焉。」

張於此文中曾列舉「吾理想中政黨之活動準則」十項。其中尤要者有：(一)、政黨當斷絕與軍人之勾結，專向國民身上下工夫。(二)、政黨之武器在以口舌以筆墨造成輿論，絕對斷絕武力關係。(三)、政黨經費應由本身籌畫，不應向政府討一文錢。(四)、政黨黨員以守紀律守主義爲惟一信條。(五)、政黨與政黨間，應有交讓精神，對於敵黨政府，又應有兩三年之忍耐，以待其從容展佈，不可存朝上臺夕推翻之心理。(六)、政黨當相戒：勿以金錢購買選民及議員，以腐敗其政治道德。(七)、政黨之於內爭，不得利用外國金錢或軍械，以壓倒反對黨。

張於舉述種種要點後復鄭重申言：「我更有鞭撻入裏之言告我海外同學：轉移國民之業，非空言所能致焉，必先有人爲之倡，而後世從而和之。故所謂品格提高，非執途人而語之焉，乃先責之吾一身而已。」「夫吾言新政治之創造而獨歸本於私人生活者，無他故焉。良心也，自覺也，爲人所同具者也。」因此，張特引述曾國藩之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視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而已）及柏格森名語（行爲之出於全人格者，始爲繼自由。生活之創造，是爲人類自由自在之行爲），勉勵國人：「慎勿謂吾躬藐焉，一部二十四史之改造，視吾一二人心理之轉移而已。」

張對政黨政治深具信念，然對梁啟超發起組織「社會黨」之議則以爲時過早。是年十一月東歸前夕，張擬具「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內容二要點：(一)民主政治。(二)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尤強調「進行方法」。是張以爲組黨，應有主義政綱及一定步驟，始可以提高國民政治品格。

民國十一年一月，張陪同杜里舒氏抵達上海。住「松社」，此即張出國前所發起組織之修養團體，亦所以紀念蔡鐸者。遇張東蓀，即以新康德學派哲學學說告之。張東蓀此後若干有關哲學著述乃淵源於此。